

中國新論社

非常時期叢書

非常時期出版事業

著者 金 溟 若

主編 雷 震 馬 宗 榮
徐 逸 樵 羅 鴻 詔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中國新論社

非常時期叢書

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

著者 金 溟 若

主編 雷 震 馬 宗 榮
徐 逸 樵 羅 鴻 詔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行

非常時期
期叢書

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著者 金 溟 若

主編者 雷 震 馬 宗 榮
徐 逸 樵 羅 鴻 詔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 錫 三

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
海 澳 門 路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 埠 中華書局

（本書校對者萬迪儒 柳啓新）（一四三三）

總序

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，國步艱難，日甚一日，九十餘年間所喪失之土地主權，已令人痛心疾首，而近年以來有更甚焉；四省淪亡，冀察危殆，華北風雲，變幻未已。此何時乎？非非常時期耶！我國疆域雖大，能禁蠶食幾時！故稍知國是者，咸覺國族滅亡之禍，迫於眉睫矣。

故吾人不能坐而待斃，敵人以全力來侵，吾人當以全力抵抗；敵人爲繁榮其生命而魚肉吾民，吾人必爲生存而奮鬥；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，俾吾國四千餘年光榮之歷史不自今日而絕。而欲達此目的，則必全國上下，共同努力，以赴國難。本社同人有鑑於此，爰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，有非常時期小叢書之編纂。其要點有三，略述之如左：

(一) 介紹古人處非常時期之嘉言懿行，以喚起民衆之民族意識及抗戰精神。

(二) 闡明非常時期之農工商人、教師、學生、婦女等應盡之職責，俾全國民衆知所以救亡圖存之道。

(三) 發表對於非常時期之政治、經濟、金融、食糧、實業、教育、民衆訓練、精神訓練、新聞事業、出

版事業、文藝等之意見，以供當局應付非常時期之參考。

惟本社同人學識有限，且此項小叢書之編輯在國內尙屬創舉，乏鴻篇巨著以供參考，故內容甚感淺薄，不足以當大雅之一顧，不過欲借以拋磚引玉云耳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中國新論社同人謹識

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目次

總序

一 總論

(一) 出版事業之意義與使命

(二) 出版物之種類與性質

(三) 出版事業之提攜者

二 出版物之社會的價值

(一) 出版物與新文化運動

(二) 出版物檢查制度之研究

1. 出版檢查之意義

2. 出版檢查之性質與範圍

3. 各國出版檢查制度之檢視

4. 我國之出版檢查·····	三七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5. 非常時期之出版檢查·····	四〇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出版事業之動向·····	四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一) 各國出版事業之趨勢·····	四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1. 蘇聯之出版事業·····	四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A) 蘇聯之出版概況·····	四四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B) 蘇聯之新聞事業·····	四六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. 日本之出版事業·····	五一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A) 日本出版界之近況·····	五一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B) 日本之新聞事業·····	五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3. 國社黨統制下之德國出版界·····	五〇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二) 吾國出版事業之趨勢·····	五四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1. 中國出版界概況·····	五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A)新書業之勃興·····	四
(B)出版界之黃金時代·····	六
(C)出版事業之衰落·····	六
(D)最近之出版界·····	六
2. 中國新聞事業之史的進展·····	六
四 非常時期出版業者應有之態度與決心·····	八
(一)非常時期之出版界·····	八
(二)非常時期之新聞事業·····	八

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

一 總論

(一) 出版事業之意義與使命

出版事業是傳播文化學術的樞紐，出版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；故估計出版事業的狀況，得以衡量民族文化的高下。蓋出版物是比較具體的，可以估計的實物，其他如教育的程度，學者名人的多寡，雖然也可以藉考試等方法準繩之，但終難究其高深。世界各國對於出版物皆有精確統計，獨我國無之。各書局、出版社雖各有出版目錄彙編之類行世，但不是限於局部，則拘於一時，欲求整個有系統的精密之統計，在著者淺狹的讀書視野內，却未嘗看見。最近亦有倣效歐美日本之出版年鑑等雜誌而編纂『全國總目錄』或『出版周刊』者，對於讀書界誠然便利不少。但這類雜誌關於出版界之情形或趨勢，諸付闕如，仍舊脫不了普通圖書目錄的範疇，或負着營業上廣告的性質，於出版事業的推進上，則無多大裨益。於此可見我國文化落後，不可不說是國

家的恥辱。

出版物既然是文化的利器，出版事業就是人類承先啓後推進文化的主要工作了。民族的力量基於知識，今日中國民族的衰弱不振，並不僅是政治經濟，軍事力量的够不上他人，基本的原因，還是由於智識的落後；所以我認為促進文化的主要動力之出版事業，倒是今日中國所謂『文化建設』的基礎工作。

中國的出版物然雖缺乏統計，但質量未嘗不豐：貧儒著述，富室叢刊，官廳文件，社團撰集，各有印刷之品。而且形成出版物之各種要素，如造紙、印刷等事業，沒有一件不是創於我國而流播歐洲的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卡德（Thomas Francis Carter）嘗著中國印刷業之發明及其傳入歐洲考（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）一書，謂造紙與印刷術，為中國發明物之影響於歐亞文化最深者。又克倫涅爾（W. J. Clennell）所著中國宗教發達史，亦稱造紙、印刷術、火藥、指南針為中國之四大發明。由此，可以推知我們先人對於文化事業曾有莫大努力，且已獲得相當成績，而後人不肖，不知積極改進，反讓學我者居我之先，這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情呀！

古代的人類，人與人之間意志的溝通，思想的傳遞和交換，僅賴言語爲媒介之工具。後來人類傳播的地域漸廣，間隔的時代漸遠，逾時逾地，不能僅靠着一出口便消滅的言語來傳達意志，乃有爲言語之代表的文字出現，以彌補這種遺憾。但僅有文字而沒有記載的工具，仍難爲功。古代記載文字的工具，有的刻於石上，有的刻於竹簡上，有的刻於木片上，有的雕在獸骨或龜甲上，有的鑄造在鐘鼎彝器上；如中國古代帝王的封禪文，刻於泰山石上，有七十二種不同的文字；巴比倫最早的文字，也刻在石碣上；希伯萊民族所傳的摩西十誡，也刻在一座小山上的。考古學上最有名的發現，如晉時出土的汲冢羣書，是刻在木簡上的；近代西域所發現的流沙墮簡，是刻在木片上的；清末河南洹河殷墟上所發見的卜辭，就是雕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商代文字；至於鐘鼎彝器，則自周以下，更代有出土了。然我國古代最流行的記載文字之法，爲篆於竹簡，所以我國書冊的『冊』字，篆文作『𠔁』，乃象竹簡成匝的形狀而成。此外與書籍有關的『簡』『策』『篇』『籍』等字，都從竹頭，從文字源流上考之，可見竹在記載工具上，是占着多麼重要的地位了。又如文學上所常見的詞彙，有『殺青』『汗青』『青史』等辭，原始的本義也是從竹簡上來的。我們稱一種著作完成或一書出版曰『殺青』，這就是因古代書於竹簡，一書之成勢必斬竹，故

稱「殺青」或曰「汗青」，則因斬竹之後須加煮瀝，使其發汗平滑可書，故有此稱。而歷史書於竹簡，遂轉稱「青史」。

不過所謂竹簡，起先以刀錐一類刻成，後來改用漆書，秦時復廢竹木而代以縑帛，也就便利得多了。時代漸進，人事日繁，需要文字也更爲迫切，他們覺得縑貴簡重，刀刻費時，漆書不便，時時想所以改良的方法。周時，邢夷造墨，秦時，蒙恬造筆，後漢宦官蔡倫以意造紙，史稱莫不從用。文字記載的工具，於是有了不少進步。可是雕版印刷的時代，尙不啻有霄壤之別，相差甚遠。

史載我國雕版印刷術之創始，爲隋文帝開皇年間，恰當公元五三二年的時候。至於印刷術之由官府出面推行，史有可考者，則自五代始。據五代史所載：『後唐明宗長興三年，宰相馮道，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，刻版印賣。』這件工作繼續不斷地進行，歷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四朝，唐明宗、後帝、晉高祖、出帝、漢高祖、隱帝、周太祖凡七主，費時二十餘年，至公元九五三年，纔將九經的木版完全雕成，印成書本頒行全國，不可不說是一件偉大的工作。而這位馮道，就是後人所奉爲印刷術始祖的『長樂老』，他所推行的雕版，也就是出版事業之創始了。

至於活字印書法，則創於宋初，爲慶曆中布衣畢昇所發明。及至元朝，又有一位王楙出來，革

新排版；再降至明世，無錫蘭雪堂華氏，名燧字文輝，始用活字銅版印書。於是，我國印刷術規模粗備，出版事業乃漸暢盛，本來很可以乘此機會精益求精，力圖改進的，奈後人中沒有目光遠大的人物出現，遂形成停頓的狀態了。循至清末，海禁開放，海外交通發達，耶穌教徒來華傳道以後，西洋新印刷術也隨同新舊約聖書傳入吾國，以致發明印刷術的中國人，反不得不仰面請教他人了。

按歐洲活字印刷的發明者，爲德人戈騰堡（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 1400—68），而他的印刷術，事實上是受十五世紀時由中國傳入歐洲的印刷術之影響，迭加改進罷了。我國之轉做歐洲新印刷術，雖爲近數十年間事，若溯其源，則遠在十九世紀初葉。而我國初期之活版鉛印，多爲西教士所經營，不過用作耶穌教的宣傳工具而已。迨上海申報館及商務印書館創業伊始，纔把這種新印刷術運用於推進學術文化的真正意味之出版事業，數十年來迭次改革，五四運動以來，新文化的機運開啓，從運動的策源地之故都北平，一直向南推動，波及於全國，刊行新文化的出版物之小書店，小報館，宛如雨後的春筍一般，此起彼伏，而推進文化的原動力之出版事業，也就日見昌盛了。

中國自有鈔錄而雕版，而印刷出版，其經過情形略如上述。按當初馮道之借政府的力量推行印刷，提倡出版事業，其初意未必存心鼓吹文化事業，不過本着一般儒生尊經衛道的見解，利用當世新發明的雕版印書法，做這一番工作，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有功聖教的紀念。然而這偶然的動機，却於無意中把這有功文化的事業，作登高一呼的提倡，好像一星火種，從五代這昏黑的深夜，從骯髒的灰燼中爆發出來，漸漸的蔓延擴大，竟成為光焰萬丈的火炬，照耀於四方。

如上所述，出版事業既然關係着民族的存歿和國家的興亡，且把握着人類進化的總紐，其意義之深刻，其使命之偉大，不言可知。那麼，與這重要的出版事業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一切人物，就是參預這偉大工作的人們，更不可稍存懈怠之心。直接參預出版事業，即與出版物關係最密切的人們，第一當然是出版業者，其次為編輯者，再次為著作者。此外，如經售書籍的小商人，代辦雜誌、新聞的代辦所，發行學術書籍的學術團體，圖書館的經營者，印刷業者，造紙業者，以及在出版事業中占次要地位的校讎者，印刷工人，製版工人，鑄字工人等，也與出版事業各有相當的關係。以上所枚舉的各種人們，對於出版事業假如沒有準確的認識，而竟欲出版事業有正常的成長，無異緣木求魚，當然是難能實現的。

本書在『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』這標題之下，敘述出版事業在非常時期應有如何決心，應取如何態度，爲本書執筆之標的。現今顯然是一個動亂劇變的時代，各國政局都呈着混亂不安的現象，各帝國主義者利害的衝突，已尖銳達白熱化的程度，隨時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可能。至於貧弱不堪的中國，外有強隣壓境，愈演愈凶，內有天災人禍，不可終日，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，正是非常時期之最尖端，如何救亡圖存，確是一個緊迫待決的問題。然而所謂非常時期，當然是對平常時期而言的相對名稱；有了平常時期所播的惡因，纔產生出非常時期這惡果來的。可是，若要闡明從那一個時期到那一個時期爲平常時期，從那一年起我們的國家纔墜入了非常時期，欲予以判然的分別，事實上是比抽刀斷水更難做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民族的立場而論，自從明末，吳三桂用方獻廷之策乞師於清攝政王多爾袞，開門揖盜以來，中國的非常時期已陷於極嚴重的狀態，一直沒有方法排除的了。民國光復之初，表面上雖很有打開非常局面而轉向平常時之可能性，但事實上並不如此，軍閥的跋扈，列強的威脅，國家的危機愈加急迫，反引起更嚴重，更尖銳的非常局面了。時至今日，情勢的嚴重已至一觸即發，有急轉直下，由非常時期而趨進戰時的可能性了。處在這非常時期尖端上的我們出版界，是不是有足以應付非常時期的相當

準備之必要呢？我們爲適應這非常時期的需要，實有闡明整個出版事業之意義，回顧出版界過去的情況之必要，然後，纔能決定今後我們所應循從之大道。

(二) 出版物之種類與性質

我們普通所謂出版，就常識的概念而言，印刷三百頁或四百頁的書籍而製本發行者，稱爲出版業者，亦稱出版家。但事實上，不僅發行單行本的纔能配稱出版事業，其他如發刊雜誌的雜誌社，發刊新聞紙的新聞社，印行地圖、掛圖的輿圖社，專印叢書、全集等預約本的出版社，代辦雜誌、報章的代辦所，總括而言，皆爲出版事業之一種；從事這些事業的人們，皆得稱爲出版業者或出版家。再就出版物的本身而論，有學術書，有文藝書，有教科書，又有所謂兒童讀物，民衆讀物，青年讀物等，其種類和性質，實在多歧而不勝枚舉的。所以我們平素所稱『出版』兩字，其範圍極爲廣泛，若要一一予以詳細的說明，決非這樣的小冊子所能做到，這裏僅能將其大概區別，作簡單的敘述而已。

茲爲便於說明，將出版物的種類和性質，分爲縱的區別與橫的區別，從兩方面分別說明於